

《史記》介紹

(紀錄稿)

白壽彝

中共中央高級黨校歷史教研室

一九六四年六月

說 明

白寿彝同志于一九六三年五月十四日、二十八日、六月六日為我校一九五九年班歷史專業，作了三次關於《史記》的報告，六月十九日又分析、講解了《史記·李斯列傳》。本稿是根據前三次速記稿整理而成的，未經本人審閱，請勿外傳。

歷史教研室

一九六四年四月一日

目 录

一、《史記》写作的历史背景.....	1
二、《史記》在史学上的贡献.....	17
(一)“究天人之际”.....	17
(二)“通古今之变”	30
(三)“成一家之言”	40
三、怎样讀《史記》	62

教研室让我来介绍一下《史記》这部书。准备讲三个問題：一、《史記》写作的历史背景；二、《史記》在史学上的贡献；三、《史記》的结构。最后，选一篇文章讲一讲。

一、《史記》写作的历史背景

司馬迁在《报任少卿书》中说，他写《史記》是为了“究天人之际，通古今之变，成一家之言”。这三句话，意思就是说，《史記》的写作目的是研究“天”和“人”之间的关系問題，把从古到今历史上的发展变化大势搞清楚，成为司馬迁一家之言。现在看来，司馬迁自我评价的这十五个字还是比较全面的，既表达了司馬迁写《史記》时的思想要求，也概括了《史記》这部书在史学上的贡献。这三句话，正是对《史記》这部书的最好评价。

司馬迁为什么提出这十五个字？这是有一定的历史条件、历史背景的。我们现在要谈的也正是这个问题——《史記》写作的历史背景。

《史記》写作的历史背景，从远处说，可以从西周末年共和执政时说起，一直讲到司馬迁写《史記》时为止。平常讲历史背景，一般只讲当时几年或几十年的事情，为什么这里要讲几百年呢？这是因为这几百年，无论从社会历史的发展或从历史研究的发展来说，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。《史記》的作者一方面接受了当时经济、政治发展的影响；另一方面又继承了过去几百年来史学思想和历史研究

成就的传统。

《史記》的写作开始于公元前一〇四年，到公元前九一年前后才写完。从西周末年共和执政（公元前八四一年），到司馬迁开始写《史記》共有七百三十八年，在这个时期，社会的变动是很多的。从西周末年开始，社会发生了大变动。

西周和西周以前的历史，所记录的都是王朝的事情。尽管殷商、西周都有許多藩国，但从甲骨文来看，記載的都是王朝的活动。从《两周金文辞大系》中也可以看出，西周的作品也都是王朝的作品，沒有記載諸侯的作品。《尚书》里的《商书》、《周书》也是讲王朝的活动。《詩經》里的《周頌》、《大雅》还是王朝的东西。王朝以外的历史記載很少。

从西周末年开始，王朝以外的历史記載才多起来，諸侯之国的活动，从魯国、齐国、晋国、卫国开始，有了記載。有紀年可考的以魯国为最早；其他国家大多从共和执政（公元前八四一年）以后历史記載才有年代可考。从这里可以看出，西周末年是个变化开始的时期。武王灭紂以后，大规模建侯封国，山东东海，黄河中下游，到处都是它的侯国，同时，把周人的农业技术也带出去了。他們利用被征服的当地人民作为劳动力，来开发土地。这在《詩經》、《左传》里都有記載。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，王朝与侯国之間、侯国相互之間往来逐渐增多，矛盾也就多起来了。有阶级矛盾，也有統治阶级内部的矛盾。王朝与侯国之間的矛盾、侯国之間的相互矛盾都逐渐增多了，他們相互之間的联系和彼此的冲突都随着往来的增加而越加频繁了。因而历史的記載也多起来了。从現在留下来的史书看，如《春秋》、《左传》、《国語》，早从西周末年，晚到周平王末年，記載的都是有关征伐、会盟、朝聘、往来的事情。这些历史記載反映了在当时社会經濟相当发展的条件下，彼此关系的复杂化。所以，

从西周末年起，特别是从东周平王起，諸侯各国的历史也开始发展起来。这个时期正像通常历史学家說的那样：周天子权威旁落，諸侯掌权了。经过春秋、战国时期，秦統一了全国。秦統治的时间很短，但战争却很多。秦汉之际，斗争也很激烈，发生了陈胜、吳广起义，楚汉爭霸，結果，由汉高祖称帝。此后，又从汉高祖传到汉武帝。《史記》的主要内容就是反映这些历史过程、事件和人物的。五帝和夏、商、周的事情讲得很少。

从西周末年到汉武帝統治的时期，七百多年当中，历史的变化很大，一个变动接着一个变动。从一个王国分封出好多侯国，其后又相互兼并，出现了战国七雄，随后秦又吞并六国，統一全中国。这是个什么性质的变化呢？这些变化究竟意味着什么呢？对于这个問題，史学界目前还没有定論。如果說西周是封建社会，那末这七百多年的变化，就是从地方割据的封建社会发展到中央集权的封建社会；如果說西周是奴隶社会，那末最晚到春秋末年，社会性质开始发生了变化，到汉武帝时，封建社会就形成了，各种制度基本上都建立起来了。汉武帝的活动，对以后很长一个时期封建社会的历史发展，留下了深刻的影响。因此，不管从哪一种分期的观点来看，这个时期都是一个大变动的时期。

《史記》的写作背景，就是这样一个漫长的、不断变化的历史时期，也就是中国形成統一的封建大国的时期。这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带阶段性的时期。司馬迁对这个变动时期的历史作了总结，在中国史学发展上建立了一个良好的传统。在司馬迁以前，《春秋》、《左传》、《国語》曾将春秋时期的历史作了总结，但它们包括的时期很短，只有二百四十多年，而且写得也不够完整。司馬迁的《史記》发揚了《春秋》、《国語》的传统，綜合了所見到的历史記載，对这个变动时期的历史作了总结。从此以后，当历史发展到一定阶

段的时候，都有历史著作出现，为前代作总结。比如魏、晋、南北朝的历史，隋修过一次，唐初又修过一次；唐中叶时，杜佑著《通典》，把中叶以前的唐代历史作了总结；北宋司马光著《资治通鉴》，又把五代以前的历史作了总结。可以说，这个传统在《春秋》、《左传》、《国语》里已经有了，司马迁的《史记》则进一步发扬了这个传统，并为它奠定了牢固的基础。

下面再分别从几个方面谈谈《史记》的历史背景。

首先，从历史观的变化来说。西周末年，各地侯国发展起来，到了秦朝，全国统一，这个历史变化很大，对一部分人的历史观发生了很大的影响。在西周末年以前，人们的历史观，主要是宗教的历史观，包括两个内容：一个是对至上神——即最高的、主宰自然的神的看法；另一个是对祖先神的看法。这种对神的看法在殷商的甲骨文中充分反映出来。据郭老研究，殷商的祖先神与至上神是合而为一的。王室的祖先死了以后就成了最高的神，殷王都可以成为“示”，“示”就是神。甲骨文有“六示”、“十示”的字样，也就是六代、十代的祖先。在世为王，死后为神，地上的王权反映到天上就是神权，这就是祖先神和至上神统一的观念。

西周时期，对神的观念有了变化，至上神被叫做上帝，同祖先神分了家。上帝是周人的神，也是各诸侯国家的神。这就把殷人的神世界化了，凡周人的势力达到的地方，都信奉同一的神，把信仰统一起来了。同时各国又各有自己的祖先神，而周人最大的祖先神是文王。《诗经·大雅》说：“文王在上，於昭于天”。这就是说文王老是在上帝的左右，影响、传达上帝的意旨，要子孙都跟着文王学，其他的祖先神的位置都不能和文王相比。周人这种宗教观念是适应当时封侯建国的形势需要的。

尽管周人同殷人对神的观念有这样的不同，但都还是宗教的历

史觀，就是說，他們都認為歷史的發展是由神支配的，是按照神的意志發展的。到了兩周之際，社會起了變化，宗教的歷史觀也隨之發生了變化。社會矛盾增加了，有許多現象是宗教的歷史觀所不能解釋的。隨著王權的開始動搖，人們對神也產生了懷疑思想，雖然還不敢說沒有天、沒有上帝、沒有祖先神，但上帝、祖先神究竟管不管事，人們有了懷疑。《詩經·大雅》是西周晚年的作品，里面表現的懷疑的色彩相當濃厚，不大相信上帝、祖先神能管事。這實際上就是王權動搖的反映，這在歷史思想的發展上是一件大事。所謂“究天人之際”，指的就是研究有關這方面的思想問題。隨著春秋時期社會情況的變化，懷疑思想也有了發展；但還是不能說不要天了，只是採取了保留的形式，表現為“天道遠，人道邇”的思想，本質上是要把天道束之高閣，轉而注意人道的問題了。這也反映了人們對至上神的有法有了變化。當然，這種思想並不是完全不信神了，它是同許多迷信的東西夾雜在一起的；但在當時，這就是新思想，是進步的。

另外，春秋時期對祖先神的看法也有了變化。不過這個變化比較保守一點，這就是《國語》所說的：“凡有大功于民者，子孫必昌”。意思是說，當代貴族就是夏禹、后稷等人的子孫，他們將來一定要昌盛。這就是貴族“輪流坐莊”的思想，已經同過去成湯或文王之子孫永遠保持王權的思想不一樣了。還有一種更為進步的思想，就是認為雖然是“有大功于民者”的子孫后代，但當他做了壞事，不為人民所擁戴的時候，一樣要下台；祖先雖然沒有地位，但其子孫立了大功，受到人民擁戴的，也可以昌盛。這個思想有一點人民性，它已經把祖先神推開了，認為主要要看本人的功業和威信。這比兩周之際僅僅懷疑祖先神管不管事的思想又有了進步。

從上述的發展過程看來，所謂“天人之際”究竟是個什麼問題呢？從主要方面來說，是個階級關係問題，也就是社會階級關係在人

們思想上的一种反映。当阶级关系发生变化时，人們对天与人的关系的看法也就随之变化。从統治阶级来看，天代表独断的、不可动摇的、永恒的統治阶级；从被統治阶级来看，天的統治是可以变的，是可以怀疑的，甚至也是可以用人来代替的。当商王或周天子的統治比較巩固的时候，人們对“天”的統治是沒有怀疑的，天是高高在上具有无上尊严和威力的主宰；但当人們对“天”的統治产生怀疑、动摇，认为天并不是不能代替的时候，这实际上就反映了某个阶级或某个集团的統治在动摇，或者要灭亡。所以說，天人关系的实质，就是阶级关系。

到了战国时代，历史思想又不同了，产生了变法思想，最突出的是法家思想。从商鞅起，就不管什么上帝、先王那一套，而讲“三代不同礼而王、五霸不同法而霸”。后来韩非、李斯都主张变法。战国末年，秦要統一全国，就大力提倡变法思想，不承认至上神和祖先神，否定旧秩序。所以，法家思想当中最突出的就是变的思想。

上述情况說明，从两周之际到秦的統一，在历史思想上有两个大問題：一个是“天人之际”的問題；另一个是“古今之变”的問題。天人关系的变化，反映了社会阶级关系的变化。在“古今之变”的問題上也是一样，主张不变的总是快要下台的統治阶级，主张变的則是要求当权的阶级或集团。因之，司馬迁写《史記》，就是要从历史上解决这两个問題。

秦統一以后，情况就和統一前不同了，它要建立自己的統治秩序，要把上帝复活起来。不过秦始皇的經驗不多，这方面做得还不到位，他只是封禪名山大川，祭祀天神，表示他的土地、人民受之于天，可以传之万代，而他自己的統治就是万古不变的神的統治。这实际上还是祖先神的思想。不过，他的做法不地道，好大喜功，穷奢极欲，引起了阶级矛盾的尖銳化；不仅人民反对他，甚至貴族也反对

他，都要起来推翻他的統治。于是，随着形势的发展，又出现一种新的观念，这就是项羽所说的“彼可取而代之”和刘邦所说的“大丈夫当如此也”，也就是陈涉所说的“王侯将相宁有种乎”。这些说法都是和秦始皇的“二世三世至于万世，传之无穷”的说法针锋相对的。

陈涉起义也还利用了一下宗教迷信思想，搞一个“魚腹获綬”，号召大家起来反抗秦的統治。司馬迁写这个事件的始末过程很有意思，这对当时的宗教迷信思想是个諷刺，也是反对天命思想的。当然，陈涉利用宗教号召人民起义，和秦始皇利用宗教統治人民是有本质区别的，前者是代表劳动人民进行反压迫的斗争，还是应该肯定的。

陈涉起义和刘邦做皇帝是两个性质不同的历史事件，但时代很相近。秦末农民起义一发动，就有很多人起来，很快便把秦朝灭亡了。刘邦出身不过是一个小亭长，后来居然做了皇帝。这在当时中国的历史上还没有过，可以说是震动人心的大事，在人们的思想中印象很深，在陆賈的《楚汉春秋》、賈誼的《过秦論》、司馬迁的《史記》当中都有反映。

刘邦做皇帝以后，統治阶级内部的矛盾表现得突出了。汉初，老百姓的生活比以前好一些，所以阶级矛盾不那么尖锐，但由于刘邦杀了不少大臣，同姓諸侯又图謀叛变，統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尖锐起来了。汉文帝設法把大的封国分成小的封国，到景帝又进一步削弱諸侯王的力量，并在七国之乱平定后，取消了王国的独立地位；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度，才奠定下来。直到汉武帝时，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度才巩固下来。

汉武帝为了巩固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度，从各方面采取了一些措施，作了一番建树的工作。經濟方面实行盐铁官卖，这是一种很重的封建剝削。因为人不吃盐不行，生产沒有鉄不行。盐鉄官卖，

就是由国家垄断盐铁的经营权利。在国家垄断之下，盐价、铁价不断提高，这简直是对人民的一种掠夺。同时，他还用均输平准的名义，把大量财富集中到中央；又让商人登记财产，向他们征收财产税，隐瞒不实报的没收财产；没收有市籍的商人的土地等。这些措施实际上是用专制主义的办法，大量进行封建性的掠夺。政治方面的控制也很紧。任用了不少酷吏，囚禁对他不满的官吏。在《史记·酷吏列传》里面就反映了不少由于实行严刑峻法，而引起武装暴动的材料。文化方面，他也没有放过。《史记·儒林列传》讲公孙弘向汉武帝上书说汉武帝给臣下的诏书、律令都是“明天人分际，通古今之义”。可见汉武帝很重视这两条。所谓“天人分际”、“古今之义”是什么东西呢？汉武帝所提倡的，并不是从秦以前就不断发展起来的进步思想。“明天人分际”实际上是提倡阴阳灾异的学说，也就是用“天意”来解释一切自然灾害和奇奇怪怪的事情，通过这种学说，给皇权罩上一层神秘的外衣，使它变成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。“通古今之义”就是在儒家定于一尊的形式上，利用儒家经典，宣扬封建制度是永恒的，封建统治的秩序是不可变易的。他们为了尊崇儒家，有时甚至在判决案件的时候，也引证《春秋》作为断狱的标准。这当然是很荒谬的。

由此可见，秦始皇统一以后，对于在新形势下如何看待“古今”、“天人”的关系问题，仅仅有个苗头；到汉武帝时才逐渐明确起来。这时候的“天人分际”、“古今之义”显然和秦统一以前不同了。汉武帝时期，在历史思想上出现了两种思想：一种是适应王朝统治要求的正统思想，以董仲舒为代表。他说：“道之大原出于天，天不变，道亦不变。”这个意思就是天人合一，古今永恒。这种思想是反动的。儒家一尊，也是董仲舒的建议。他说现在有各种学派和议论，妨碍统一，所以他主张发扬《春秋》的大一统思想，取消各家学说，定儒家于

一尊。这是典型的正統思想。和董仲舒的正統思想相反的，是以司馬迁为代表的一派思想。司馬迁继承了秦統一以前的历史思想的优良传统，并有所发展，在有些問題上针对当时的政治情况进行了批評。他在《报任少卿书》中所說的“究天人之際，通古今之變，成一家之言”，正是和董仲舒的思想針鋒相对的。董仲舒是他的老师，他跟董仲舒学过公羊学，不过他不属于公羊学派。他主张“究天人之際”，而不同意“道之大原出于天”。“究”就是穷本究源，“究天人之際”就是要研究天与人之间的关系。“通古今之變”是首先肯定有变，不是“天不变，道亦不变”，而“通”就是要搞通古今的变化。

“成一家之言”就是要自成一家，而不是儒家独尊。所以說司馬迁的思想是进步的，具有人民性的，道理就在这里。司馬迁不反对統一，但反对暴虐专制；他不主张农民起义，但认为搞政治要得人心，应该对人民有好处，否則，你的統治就不能巩固。有人把司馬迁抬得太高，說他歌頌陈胜等农民領袖，歌頌农民起义。实际上沒有这种事情。但他的思想，在当时來說，是对人民有利的。

司馬迁說的三句話，十五个字，是很重要的，它有学术意义、科学意义和政治意义。

司馬迁写《史記》的历史背景，从社会历史变化、政治变化、史学思想的变化来讲，已如上述。总之，通过写《史記》，他一方面把过去的历史作了总结，继承和发揚了过去历史思想中的优良传统；另一方面他针对当时的政治进行了批評，为当前政治服务。

下面讓我們从历史著作的源流发展，来研究一下《史記》的历史背景。主要是从历史編纂学方面談一談。

《史記》是紀传体的书，是二十四史中第一部紀传体的书。但說它是紀传体，还不能算是一个很完备的說法。因为二十四史中間《史記》以外的书，有的沒有表或志，但紀同传是各书都有的，所

以就統称为紀传体。《史記》的本紀、列传虽然比較多,但另外还有世家、表、书。“世家”就是小的本紀。諸侯之国,或者某方面有成就的、影响大的人物都有“世家”,如《孔子世家》、《陈涉世家》等。所以,說《史記》是紀传表志体的书,还比較合适些。

从历史編纂学的发展来看,《史記》應該說是綜合体。它把过去記載历史的各种体裁都綜合起来了。虽然其中任何一种历史体裁都不是独創,但經過綜合提炼,使它們相互配合成为一种完整的形式,却又是新的东西。司馬迁搞出这种体裁不简单,不是单凭他的天才就能办到的,这是和长期以来的历史淵源有关的。

司馬迁以前,可以說沒有一部具有完整規模的历史記載。据現在掌握的文字資料和考古材料来看,最早的历史記載是甲骨文。甲骨文以前有沒有記載?不敢說沒有。現在考古发掘出来的东西,也有些比較早的,类似文字的东西,但材料比較少,而且不能断定它就是最早的文字。現在姑且不談这一部分,讓我們从甲骨文讲起。

甲骨文算不算历史記載?从原来刻甲骨文的主觀意图来看,不好說是历史記載。它的主要内容是这样四部分:第一部分是占卜的日子;第二部分是为什么事占卜;第三部分是占卜的結果;第四部分是关于占卜以后的实际效驗的記錄。如某一天要到某地去打猎,事先占卜是“吉”,結果打猎得到了鹿、鸡、兔等。这就是占卜以后的实际效驗。这一部分不是每片甲骨文都有,許多甲骨文只有前三部分。就是有第四部分的,当时的主觀意图也不是为了載入史册或流传后世。总之,甲骨文很简单,由時間、地点、人物、活动四个部分构成。反映在甲骨文中的時間观念是很貧乏的,一般只有干支計日,后来才慢慢有了月,很少紀年。記時間的次序是日、月、年,有点像西欧人的記法,这說明当时的時間观念不强。甲骨文是最简单的文字記錄,它初步具备了历史記載的最简单的形式,同后

来的历史体裁有关系，可以說是后来編年体史书的始祖。

甲骨文的字数不多，少者几个字、十几个字，多者也不过几十个字、百把字。郭老的《卜辞通纂》中，有一片甲骨文有六十三个字；现在还发现有一百多字的，不过六十个字以上的甲骨文不多，一般只有二、三十个字。但金文就不同了，一方面是時間比較长，从殷商末年到秦的統一都有，而主要是在西周；另一方面字数也比甲骨文有所增加。西周时期的金文，字数在一百字到五百字左右的已有相当数量。它記載的内容比甲骨文丰富了，对事情的发展过程有了記述，还有記言的。金文在時間观念上也比甲骨文有所发展。表述時間的形式有两种：一种是日、月、年，另一种是年、月、日。年、月、日比日、月、年进了一步，年的观念比較明确了。

与甲骨文、金文同时并行的还有《书經》。《商书》的著作年代問題較大，其中《盘庚》篇很古奥，不好懂，一般认为可能是殷代的东西，但也經過了后人的加工。这篇文章很长，有一千多字，估計不会是盘庚时的著作，但有殷代的东西。《周书》比較可靠一些，它的内容和《商书》一样，主要都是帝王、貴族的語录，但也有新的东西。其中《金縢》、《顾命——康王之誥》两篇从历史編纂学來說就包含有新的因素。金縢是西周王家收藏重要文件的金属器具。《金縢》就是以它为綫索，叙述武王生病的时候，周公祈祷上天和祖先保佑武王，不要让他死去，并愿以自己的生命代替武王。祈祷以后他就把祝文藏于金縢中。后来成王即位以后，三叔叛乱，造謠說周公要取成王而代之，成王听到謠言后对周公的信任有所动摇。当时周公到东方去了，周朝发生了大風灾，成王想知道为什么出現这种現象，于是打开金縢看看先王留下了什么东西，不意却发现了周公的祝文。于是成王大为感动，连忙把周公迎接回来，天气又变好了，被風吹倒的树又复活了。这个記載是紀事本末体。以金縢为

线索，从周公藏书到成王发书，把好多年的事情写成一篇东西，这是《尚书》中的一种特殊体裁，也是一个新的发展。

《顾命——康王之诰》，现在的本子《古文尚书》是两篇。《今文尚书》有争论，有人说是两篇，有人说是一篇。不管两篇还是一篇，文章却是连续的。“顾命”是成王临死前对大臣的遗嘱。“康王之诰”是写大臣受遗命之后，迎康王即位，康王在当时讲的一番话。这两篇东西内容都是成康之际的记载，但有两种性质：一种是纪事本末体，写的是成王去世、康王继位的经过；另一种是记述成王留遗嘱和康王即位时的典礼。写得相当具体，文章很好，把繁琐的事情写得很有趣，这也是纪事本末体，是记述典礼最早的一篇东西。《尚书》里的这两篇文章是纪事本末体的始祖。不过《尚书》有个大缺点，就是一般不纪年、月、日，因为它是官方文书，不是为了写历史而保存下来的。

《诗经》里面也有新的东西。现在文学家讲《诗经》，一般认为《国风》最好，价值最高，雅、颂要不得，是庙堂文学。从历史家的角度来看，则恰恰相反，雅、颂最有历史价值。《国风》多是讲男女爱情的故事，历史价值不及雅、颂，而且记载也没有雅、颂具体。我们讲的雅、颂就是《大雅》、《周颂》。《大雅》里的《生民》、《公刘》都是好东西，值得注意。《生民》是讲后稷一生的主要事情。后稷的母亲没有结婚，在走路时踏上了巨人的脚印就怀了孕，后来生了后稷。产后，她以为不祥，把后稷扔到偏僻的地方，但牛羊都不肯践踏他；后来又把他扔到冰上，鸟儿又飞来用自己的羽翼保护他。这样，她看出孩子是个不平凡的人，才把他抱回养大。后稷很小就会种地、选种，有一套办法，把庄稼种得很好。丰收以后他又把粮食磨了，作为食物，并酿酒、烧肉，祭祀上帝，上帝很高兴。《公刘》是讲公刘建立国家、王朝的过程。这两篇是歌颂古代英雄

的传说，是传记体。这种体裁在以前的甲骨文、金文、《尚书》中是没有的，它在历史编纂学上又是一个发展。雅、颂是史诗，它的价值不能小看，有很多有关周代社会的生产关系、劳动情况等重要记载，在别处找不到的，在《周颂》里却有一些。把《大雅》的诗歌按歌咏对象的时代排列一下，就成了一部西周兴衰史。

总之，殷商时期的历史记载已有编年、纪事本末、记述典礼、传记等多种体裁。记述典礼就是后来的“志”，亦即《史记》的“书”。同时，甲骨文、金文、《尚书》、《诗经》所记的都是王朝的事情。从西周末年开始，各国都有了历史记载，主要是编年史。春秋时期，历史记载最发达的国家第一是鲁国，第二是晋国，第三是楚国。孟子说：“晋之乘，楚之檮杌，鲁之春秋，一也。”孟子特别提出这三部书，就因为这些是当时有名的书，它们都是编年史。春秋时期的这些历史著作，现在已经看不到了。记载这一时期的历史的，有孔子修的《春秋》，另外还有《国语》。《国语》记载晋国、楚国的事最多，《春秋》记鲁国的事最多。春秋时期的编年史比以前也有了发展，这可以从《韩非子》、《吕氏春秋》、《墨子》所引证的当时的记载中看出来。当时的编年史有两种形式：一种形式就是像《春秋》那样，按年把一些大事记下来，但比较简单；另一种形式也是编年的，但把事情的过程记载得很细致。所以，认为《春秋》是当时史书的唯一形式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。

春秋时期的历史记载最大的发展有两点：第一，历史记载不仅限于王朝的活动，诸侯之邦的历史也加以记载。第二，各国的历史书不光记载自己国家的事情，还记两类事情：一类是记会盟的情况，包括参加会盟的各个国家的历史；另一类是记“告”，即记述别国来告知本国的事情。

战国时期，历史记载又有了进步。我们知道的比较早的历史书

是《春秋》，它是春秋末年、战国初年的作品，据說是孔子写的。《左传》、《国語》則是战国初年重要的史书。特别是《左传》，从历史編纂学上看，这部书有了很大的发展：第一，《左传》不是一国的史书，它把当时主要国家的历史都記載在一起，帶有綜合性，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。第二，《左传》采用了許多不同的历史体裁。應該說，綜合体不是从司馬迁开始的，《左传》已經开始了，不过，一般讲《左传》是編年体，因为編年体是它的主要体裁。此外，也有紀事本末体，如把晋文公重耳出亡和周遊列国十八年的历史記在一起，这就是紀事本末体。第三，記言和記事揉合得很好。总的讲是按年記事，但在事情的发展过程中有什么議論也有較詳細的記載。总之，《左传》是綜合性的記載，不管从形式上、内容上說都是帶綜合性的。

另外，还有一本书叫《世本》，記載王、侯、卿、大夫的世系。这本书是战国时期写成的，汉朝时又增加了一些内容。

《左传》以后还有一些书，现在都看不到了，这里就不談了。

到此为止，历史編纂学上已出現編年体、紀传体、紀事本末体等三种体裁。《四庫全书》把历史书主要分成这三大类。編年体以年为主；紀事本末体以事为主；紀传体以人为主，但也記述典章制度。

《史記》以前的历史記載有些什么共同的特点呢？甲骨文就不必說了，这条和那条不相干，各自独立。《詩經》、《书經》每篇也是各自独立的。《春秋》是按年編的，但在《春秋》中看不出历史发展的內在联系。《左传》通过研究可以看出事物之間的联系，事情的記載始末有些照应，但从全书看，記載也是比較杂乱的。所以，《史記》以前的历史著作的形式，虽然具备了各种历史記載形式的萌芽或幼稚状态，但不完备，記載历史事件缺乏內在联系，甚至外部的、表面的联系也不多，而是彼此孤立的、片断的記載比較